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质、量、度问题

庞 虎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长规律,必须重视质量度的视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质就是实现场域的本土化、时间的当代化、主体的大众化;量表现为曲折化的斗争态势、复合状的结构体系、台阶式的发展轨迹、继发型的运行效果;掌握度要遵循真理、实践、渐进的科学原则。坚持质、量、度的三位一体,就是坚持用社会实践检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与否。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理论结合实践

[中图分类号] 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12)04-0023-03

实行和实现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的必由之路,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创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功法宝。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探析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规律,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质,是指中国国情环境赋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以独特内涵、独有品质。

(一)场域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指导意义,只有与现当代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体现出应有的价值。诞生于欧洲近代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理论渊源、体系内涵,还是表达方式、思维习惯,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只有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些最优秀的东西,这些东西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民族的财富^[1]。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场域差异,无形中增加了应用的难度,使得马克思主义不可能直接成为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现成模

板。虽然中国人民所接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检验。但是,相对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它仍然是陌生的舶来品。产业工人主导的城市暴动式革命不符合中国实际。因为,农村是中国人生活的主要经济基础。中国革命必然被赋予不同于苏联革命的农村性质,农民注定要担当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长期以来,由相对封闭的乡土社会提炼成的内敛型民族主义文化传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后因素,是基于文化和历史骄傲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中国人民只能接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马克思主义要扎根于中国并且发扬光大,就必须融入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汲取中国人民深厚的传统资源。于是,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

(二)时间的当代化。思想的本质是人类劳动所升华的文明成果和劳动过程所体现的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事实上,社会实践的真谛就在于永无止境地探索创新。其理论成果只是人类进一

[收稿日期] 2012-04-18

[作者简介] 庞虎(1978-),男,山东茌平人,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

步发展的起点而不是终结。马克思主义要永葆生命力,就必须打破思想禁锢,始终与时代同行、与实践同步,时刻准备迎接复杂多变的客观现实的挑战。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思想,必将遭到时代的淘汰。以引领时代潮流为己任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围绕发展变化的时代主题,清醒地认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要求 and 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认真总结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大政方针,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带领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4]。同时,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提出新思想、充实新内容,促进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还马克思主义以开放、灵活、创新的本质特色。

(三)主体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不是少数知识精英用来学术论争的抽象工具,而是指导人民大众从事革命、建设、改革的现实武器。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5]。马克思主义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切实转化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精英凭借独特的文化优势,理所当然地成为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先锋,但不可能垄断这一思想。在当今社会,文化的拓展和教育的普及,使人民群众不再是封建、愚昧、落后的代名词。他们是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体、文明进步的真正动力。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定要化解精英意识,树立大众立场,把尊重人民群众的思想权利置于重要地位,自觉接受群众的论争、评判,在斗争的风雨中,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6]。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定要摒弃救世主的心态,改进宣传策略,变灌输为疏导,鼓励民众勇敢思想、大胆创新,实现由被动启蒙者、承受者向主动求知者、应用者的转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思想文化基础。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量,是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态势、要素结构、发展轨迹、运行效果的具体表现。

(一)曲折化的斗争态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反对僵化思维、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辟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决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定是创新与迷信的交锋、新思想与旧观念的交锋。在交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破字当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但是,新思维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更不会直线上升,而是时刻面临错误思想的挑战。这一挑战有时平稳,如五四运动前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有时激烈,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对王明机会主义路线;有些还会反复登场,异常顽固,增加斗争的复杂性,如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照搬城市中心论为核心的苏联革命模式,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演化为重工业建设为核心的苏联经济模式,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重蹈高度集权为核心的苏联政治模式。迂回曲折的斗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特色。

(二)复合状的结构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构是艰巨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多层次、多维度、多要素的整合协调。处于基础地位的是方法论体系,核心是理论联系实际,即有的放矢。的是中国革命,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找这根矢,就是为了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7]。由此辐射出本体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价值论——以人为本。它们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过程。在方法论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任务系统:把握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多领域,认清国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和人口、地理、历史、环境等多因素,付诸实践——革命实践、建设实践、生活实践等多种类。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部分。之后,从任务系统派生出诸多必须正确处理的矛盾关系,如理想与现实、国情与世情、精英与民众、继承与创新、普及与提高、西方文明与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等。

(三)台阶式的发展轨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呈现出梯次性飞跃、阶段性调整、迂回性前进的特征。反思苏联模式,促成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对城市武装起义革命道路的进步;反思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纠正左倾错误,才有经济建设对阶级斗争、改革开放对闭关锁国、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

科学发展对粗放增长的进步。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大胆创新,适时总结经验,及时调整实践,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获得新起点、迈向新台阶、走上新路径,最终达到发展进程的连续与阶段、继承与变革的辩证统一。

(四)继发型的运行效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效果显现在触发这种进步的个别问题和具体问题上,并以此为起点创造和衍生出更加广阔的后续效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能均衡推进,而是首先在某个领域、某个地区、某个群体引起观念变革,进而激励其他领域、地区、群体产生效仿成功榜样的心理联动,通过学习、竞争、认同达到辐射传播,逐渐变成全社会共识。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给人们的,不仅是某一问题的具体解决,更重要的是彻底清除僵化观念和重新把握科学思维。从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礼教的痛斥、延安整风对教条主义的清算,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两个凡是破除、南方谈话对资社之争的化解、十五大对公私之辩的澄清,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谐社会的架构,无不包含思想解放的功绩。思想解放激活中华民族文化底蕴所包含的开放思维、创新意识、科学精神、民本观念,成为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流而深入人心,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推进的不竭动力。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度,是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解放加上科学创新基础上所实现的、继前人又突破陈规的理性进步及其思想原则:

(一)真理原则。不断追求真理,是科学理性的具体体现,也是思想发展的正确航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归根到底,要在与本土文化的交融中接纳真理,在与时代主题的衔接中丰富真理,在与民众实践的结合中应用真理。正如德国近代思想家E·卡西勒所言,理性不是精神宝库,而是引导我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8]。在

理智力量的指引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终于在纷繁激烈的思想斗争中,确立民族救亡的科学真理。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发展的每一步都渗透着对真理的理性追求。通过

一次次的思想解放,真理最终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追求和内在动力。而现阶段,中国人民最大的理性就是,能动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体系。

(二)实践原则。实践是思想发展的最终归宿,也是衡量理论成果是否科学的根本标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思想认识问题,更是重大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分歧,要靠实践检验;社会主义改革中遇到的重重困惑,要靠实践来解决。社会实践是新思维、新观念产生、发展并最终确立的内在依据。而脱离实践的所谓思想解放,不过是从思想到思想、从观念到观念的纯粹意识造反,是被马克思批判过的面对世界的无能为力^[9]的思想表现。符合实践需要、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思维变革,不存在到头或过头的问题,应该大力提倡。违背客观规律、阻碍实践发展的思想解放,则必须摒弃。1980年代,一些人打出新启蒙的旗号,不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否定社会主义实践,将脱离中国实际的主观臆想冠以思想解放,实际上是为全盘西化造势。这种外延无限扩大的所谓解放,抹杀评判是非的客观标准,带来思想认识的扭曲和混乱。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立足实践,防左反右,既要扫除解放思想的障碍,又要把握科学发展的方向;既要遏制僵化思想的滋长,又要防止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稳步前进。

3、渐进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时之举,更不能一劳永逸。接受先进思想、确立新的观念,总要经历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渐变过程,最终实现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新老交替和文化转型。人们的能动改造,可以加速或延缓这个过程,但不能使思想变革超越量的积累而直接步入质的突变。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多采取大规模政治运动式或群众运动式的外生型动力模式。以这种方式推动思想变革,在短期内能够形成强大声势,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根本违背观念演变的渐进规律,损害思维变革的内在机制。其结果只能是表层意义的改头换面。这时,如果缺乏健全的法制保障,一旦群情、激情难以克制,任何理性都将被抛之脑后。即使有个别清醒者(下转第78页)

规,建立相应的制度保证。二是培育公民社会,大力发展从事社会公益活动的社工机构。成熟的公民社会是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前提。政府加大财政投入、提高教育质量,更要还权于社会、还权于公民,逐步实现公民自治、社区自治,从根本上拓展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有限空间。具体来说,社工机构要有量的规模,也要有质的提升,才能保证政府购买到优质高效的社工服务。三是改革社工机构的管理体制,

变革政府双重管理社工机构,实施社工机构的独立法人制度。双重分层管理体制增加社会工作机构的注册困难,也为业务主管单位过多介入社会工作机构提供体制性条件。四是大力培养社工专业队伍,强化社工专业技能,实现社工的职业化与专业化。五是完善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制度建设,尤其是在招投标、服务定价、绩效评估等方面作出详细的制度设计,积极探索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新方式。

[参考文献]

- [1]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K].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2] 李太斌.政府购买服务推动社工机构发展[J].北京:中国社会导刊,2008(4):20-21.
- [3] 刘庆元,温颖娜.政府购买社工服务中的机构诉求[J].南昌:社会工作(实务版),2007(11):11.
- [4] 任伟.购买服务 政府与社工温暖握手[J].南昌:社会工作(实务版),2007(11):6.
- [5] [美]理查德·C·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M].孙柏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6] G.Stoker. Public Value Management: A New Narrative for Networked Governance?"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36, no. 1, 2006, pp. 41-57.
- [7] 闫健.民主是个好东西 俞可平访谈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5.
- [8] 闫伟.对于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模式构想[J].社会工作(实务版),2007(11):8-9.
- [9] 朱希峰.政府购买社工服务从“四性”向“四化”转变[J].社会工作(实务版),2007(11):7-8.

(责任编辑 周晓中)

(上接第25页)试图力挽狂澜,也会无济于事。文化大革命就是明证。德国近代哲学大师伊曼纽尔·康德说过,通过一场革命可能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变革^[10]。总之,思维的变革是长期艰巨的发展过程,不

可能指望几次群众运动就能轰出思想奇迹。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实现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且只能遵循科学发展的轨迹,顺应思想解放的大潮,有步骤地渐次推进,努力追求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成果。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刘少奇选集:上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22.
- [2]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M].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167.
- [3]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 [4] 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N].北京:人民日报,2007-06-26(1).
- [5]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 [6]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91.
- [7]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 [8] [德]E·卡西勒.启蒙哲学[M].顾伟铭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11.
- [9]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7.
- [10] [德]伊曼纽尔·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G].何兆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4.

(责任编辑 周晓中)